



著名楚辞专家经典讲录
踏勘传统探究为学之道

楚辞讲座

汤炳正

讲述

汤序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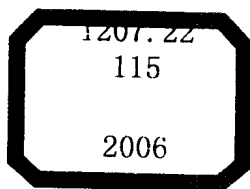
整理

汤炳正乃章太炎入室弟子，中国屈原学会第一届会长，他的《楚辞》课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轰动学界，至今还有天津津乐道当年听讲之盛况。本书即他的课堂讲录，着重讲《楚辞》研究中比较重大的问题及为学之道，信手拈来，如数家珍，通俗深刻。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汤炳正
讲述
汤序波
整理

楚辞讲座



辞

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楚辞讲座/汤炳正讲述;汤序波整理.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9

ISBN 7-5633-6189-8

I. 楚… II. ①汤…②汤… III. 楚辞-文学研究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93194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泰安市灵山大街东首 邮政编码:271000)

开本:635mm×965mm 1/16

印张:16 字数:175 千字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6 000 定价:2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正 编

第一讲	治学与学风	(3)
第二讲	《楚辞》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24)
第三讲	总论屈原	(44)
第四讲	屈原的作品	(62)
第五讲	《史记·屈原列传》的问题	(82)
第六讲	屈原的生年月日	(96)
第七讲	屈原的才能和学识	(104)
第八讲	屈原的官职问题	(112)
第九讲	屈原流放的路线与沉江的年代	(118)
第十讲	屈原的政治理想	(125)
第十一讲	屈原的思想流派	(138)
第十二讲	屈原与爱国主义	(150)
第十三讲	《楚辞》成书的过程与版本概况	(162)
第十四讲	《楚辞》研究史述略及今后研究的展望	(182)

副 编

自述治学之甘苦 (197)

我与《楚辞》 (203)

《屈赋新探》后记 (208)

《楚辞类稿》自序 (213)

《楚辞研究与争鸣》序 (215)

《楚辞研究》(第一辑)前言 (217)

《楚辞研究》(第二辑)前言 (220)

《楚辞研究全书》序 (224)

《楚辞学文库》总序 (226)

二十集电视剧本《屈原》审查意见 (228)

记姜亮夫教授 (232)

学术与友谊 ——我与竹治贞夫教授 (236)

编后记 (245)

正 编

治学与学风

我这次给同学们讲《楚辞》，有这样一个考虑，就是先讲一讲屈原的情况，再讲一讲《楚辞》的情况，最后讲一讲从古至今以至于当代《楚辞》研究的情况。跟以前我讲授《楚辞》，无论从体系来看，还是从内容来看，都有很大的不同。当然也有共同的地方，绝不可能完全不同。

我的讲授是概论式的。但是，在概论式的讲授之中，我准备注意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对于屈原的研究、对于《楚辞》的研究中比较重大一些的问题，前人争论得比较多的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或者是解决得不好的问题，我就着重地讲一讲，强调一下。关于我自己个人的研究情况，几十年来也有一些心得体会，有一些探索性的结论。但这次讲授，我不准备去发挥它。如果讲授需要的话，我也只是略略地提出来加以说明或介绍；如果将来有机会的话，我可以专门讲一讲自己的收获和从事科学研究的甘苦。

我一贯的有个想法，即讲课必须有逻辑性，才能增强说服力。但是我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太好，话说多了就感到头晕。所以这次讲授，也只能是漫谈式的、“摆龙门阵”式的。

在这一讲中，我想先讲一讲治学与学风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也与《楚辞》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我打算先给同学们谈一谈。

我们知道，古今中外，凡是在学术研究上有成就的学者，他们治学都有各自不同的风格和特点，但是总括起来，是有共同性的。同学们将来书读多了，是能够发现这一点的。因此，我主要谈一谈

这些共同性的东西，这对大家治学是有启发和帮助的。

第一，是端正学风的问题。

我的想法是，我们应该提倡实事求是、严谨刻苦的学风，跟解放思想、勇于探索的学风高度结合起来，才能在学术研究上有所收获、有所创造。

学术研究是带有高度创造性的脑力劳动，又是极其艰苦的脑力劳动；所以，我们首先要踏踏实实地学习，认认真真地读书（不要朝三暮四、心有旁骛）。一个人在学术上要有所突破，往往要花极大的心血，少则三五年，多则十几年、几十年，有的甚至是一辈子，才可能在他所研究的领域内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天道酬勤）。同学们可能知道，余嘉锡先生的《四库提要辨证》，用了几乎一辈子的工夫。他小时候读书，觉得《四库全书总目》这部书对他有很大的帮助；但是他同时也发现，这部书存在着许多问题。于是他下决心，研究这部书。他花了几乎毕生的工夫，下了很大力气，写出了《四库提要辨证》这部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著作。这部书“文革”之前出版过（1958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近几年又出了（198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标点本），同学们可以读一读。

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并不是个别的和特殊的现象。德国大文学家歌德写《浮士德》，边写边改，花了六十年时间，直到他去世前才定下来。俄国大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名著《安娜·卡列琳娜》，修改了十二遍之多。可见，无论是比较成功的学术著作，还是比较成功的文学作品，不下点踏踏实实的苦工夫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应该提倡下苦工夫读书、下苦工夫钻研学问的精神（一个学者应不为利所惑、不为欲所动，耐得住寂寞、忍得住艰辛）。

在学习和钻研的过程中，渐渐地确立了一定的方向。当你的研究工作决定了方向，就应该全力以赴，用毕生的精力去学习和探索。^① 在方向没有决定以前，应该慎重，不要轻率地决定；而在方

^① 波按：先祖父景麟公曾告诉我，他很欣赏数学大师陈省身“一生只做一件事”的专一精神。

向决定之后，就要坚持，不能够见异思迁，或者知难而退。问题不在于你绝对不更改，而在于应该慎重考虑。如果见异思迁，追求“浪头”，追求时髦，其结果必然是一事无成。

那么，一个人的研究方向如何决定呢？我是这样考虑的：应该首先看一看个人的兴趣所在，或者是性情所近，或者是基础专长，^①在西方的科学家中有这样的一句话：要根据自己的才能选择研究方向。这话很有道理。人才学也强调要根据自己的各方面的情况进行“自我设计”，就是这个意思。

我所说的三个方面，即个人兴趣、性情、才能，以及基础都要考虑，不要偏于一个方面。现在学术界，有的人考虑钻研方向时，首先想到的是什么“热门”、“冷门”问题。大家都在搞，好，我也去凑个热闹；别人不搞，我搞了则独树一帜。这种现象是很不好的。我认为在选择研究方向时，不要过分想到什么“热门”、“冷门”问题。拿文学史来说，对于各个时代的重要作家，或者是对于文学史上带有关键性问题的现象，就是应该花大的气力去考虑、探索和研究，以期发现新的问题，得出新的结论，从而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高一步，对学术研究增添些新的东西。而不要过多地顾及什么“冷门”、“热门”问题。

前面我讲到兴趣。我要指出的是，兴趣这个东西是可以在读书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培养的。你在没有钻进去之前，对什么东西都是没有兴趣的。而当你真正钻进去之后，你就会感到兴趣无穷，乐趣无限，^②而别人则未必有你那样的心情。科研有时真像陆游诗歌所说的那样：“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当你感到钻不通的时候，真有点无路可走；而当你通过苦苦探索，获得了新的认识，有了新的结论，则“柳暗花明又一村”，真是其乐无穷。而你对所进

① 波按：景麟公曾说：“做学问，趋热门固然不对，寻冷门也未必是，而当以情之所钟，性之所近，人类之所需为准。”

② 波按：景麟公曾在给我的信中说：“兴趣的产生，必须是对某一学科深入钻研，并且钻了进去。如果只是走马观花，或被迫学习，那就不会有什么兴趣。”

行的研究课题的兴趣，也就更大了。

关于刻苦钻研，大家是知道古今中外不少实例的。归结起来说，就是：天才是从勤奋之中形成的，灵机是从钻研之中出现的，机会只是偏爱那种有准备的头脑。人们往往在某某人有了发现、有了成就时称之为“天才”，但不知道其人埋头科研，含辛茹苦，付出了多大的心血；人们往往爱说某某人的发现是“灵机一动”，但不知道其人刻苦钻研，所谓面壁十年，偶尔得之；人们往往埋怨自己没有遇到那个“机会”，但不知道当你学术准备不够时，什么样的机会也不会来找你。

总之，做学问、搞科研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是一个勤奋的过程，休想不劳而获，或者侥幸取胜。^① 我们都知道，太炎先生是晚清以来的国学大师，他天资聪慧，这一点大家都承认；但他发奋刻苦，则未必人所共知。我曾听章师母讲过，太炎先生在日本时，连下班的路上都在考虑学问上的问题。他下班回家，有好多次是钻进别人的宿舍去了。人家认为是客人来了，和他打招呼，他才恍然大悟。有人说太炎先生奔走革命，又有那么大的学问，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天才”。殊不知太炎先生连走路都在考虑学问，这是何等的勤奋和刻苦！我还听章师母讲过，太炎先生常常深夜突然披衣起床，拉开电灯，到书架上去翻书。原来他并没有酣睡，还在考虑学问。有一回，他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中，大骂注《左传》的杜预。这些事都可以看出一个学者毕生是怎样地勤奋和刻苦的。读书学习、钻研学问已成了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所谓“食不甘味，夜不能寐”，达到了忘我的地步。

所以我说：天才是从勤奋中产生出来的。而另一方面，即使是

① 波按：先祖父景麟公曾谆谆告诫我：“读书做学问是没有任何捷径可走的。”记得，他还曾向我推荐过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一文。并把如下这一段话打上着重号：“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予之所得也。”

一个天才，如果不勤奋，也会变成庸才，最后一无所成。这样的例子很多。在我过去的同学中就有这样的人。

我前面谈了“机会只偏爱那种有准备的头脑”，这也是有不少例证的。发现辐射现象的法国物理学家贝克勒尔，1903年（与居里夫妇一同）得了荣誉极高的诺贝尔物理奖。据说在贝克勒尔之前，有的实验员发现铀包在感光纸里感了光。实验员得到的结论是这两种东西不能放在一起。而贝克勒尔却进一步发现了铀的自发放射性元素，在科学研究中有了新的收获和突破（科学界以其名字“贝克”，做为辐射度量的活性单位）。这说明，机会是以踏踏实实做学问为前提的。为什么那位实验员不能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呢？因为他压根儿就没有这方面的科学准备，所以对感光那样重要的现象也放过去了，失去了一个大好的机会。

我个人在研究《楚辞》的过程中，也有不少机会。我们知道，《楚辞》研究已有两千年的历史了。先秦的资料一共就那么一堆，摆在那里。有的问题别人没有发现，而我却发现了，并得出了新的结论。例如《江汉考古》1981年第1期上刊载了一篇文章，作者（郭德维先生）根据曾侯乙墓中出土的文物，对闻一多同志所说的《天问》里的“顾菟在腹”中的“顾菟”是“癞蛤蟆”的看法提出了异议，认为“顾菟”就是兔子。而我则根据各种资料，证明了“顾菟”实质上是“老虎”。这个结论是从来没有人提及过的，而这又进一步证明了我原来提出的“神话往往以语言因素为媒介而逐步演化”的观点。我之所以能得到这个崭新的结论，是因为我成天都在思考这些问题，现在看到新出土文物的拓片，^①心有灵犀一点通，就碰上这个机会了。^②

以上主要谈的端正学风的第一个方向的问题，即我们要提倡实

① 波按：即曾侯乙墓箱盖上“近虎而似兔”的兽形图像。景麟公认为它保存了“由兔变虎的过渡形象”。

② 波按：何新先生认为景麟公释“顾菟”为“于菟”，即老虎，“极为正确”；龚维英先生认为景麟公此说，“实乃卓识”；而钟仕伦先生则认为景麟公“考证确凿”。

事求是、严谨刻苦的学风。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是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和创新。

搞科学研究，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要求去发现规律。例如我们研究的中国古代文学，就要求研究复杂的文学现象，总结文学发展的规律，用以指导社会主义文学的创作实践。但是，就每一学科本身来说，要解决这些问题则是十分艰难的；加之有时还有外来压力、讥笑，甚至于诽谤、迫害，工作起来就更难了。在过去时代，不少科学家在政治上受迫害，学术上也不被承认。外国的哥白尼就遭到了这样的厄命；还有达尔文，也是一样（此外，例如布鲁诺被烧死、伽利略被判终生监禁、马丁·路德·金被暗杀）。在我国“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都遭到了非人的待遇和迫害，最轻松的也要把你的论点提出来在斗争会上批判一通；不懂也要装懂。要想从事科研工作，根本是不可能的。今天当然时代不同了，但是，学科本身的困难总还是存在的，外部世界的压力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因此，我们仍然要提倡勇于进取、勇于探索的精神。

当然，我们所说的勇于探索，是基于踏踏实实地做学问，而不是草率行事，追奇尚怪，更不是哗众取宠。

在探索的过程中，想像力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说文学创作需要想像力，人们都会承认；而我们说学术研究也需要想像力，有的人就不承认。作科学研究也需要想像力吗？是的，不仅仅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也需要想像力。爱因斯坦有这样一句话，他说：想像力比知识还重要。这句话正是从探索的角度提出来的。他还有一句话说：想像力是科学研究中“实在”的因素。我们要注意“实在”二字。爱因斯坦的话强调了想像力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而想像力又绝不是空虚的东西，不是毫无根据、毫无目的、毫无基础的瞎想，而是“实在”的东西，是建立在探索精神上的想像。可以这样说：没有想像力就没有探索力，就没有创新，就没有突破。

在科学研究各个领域，在某一门具体学科中，都有不少权威。

有的同志认为，既然有权威在那儿站着，这门学科我最好不要去动、不要去摸。这种看法是要不得的。我们应该懂得，再大的权威也不能终结该门学科，科学不会有顶点，也不应该有禁区。不能说某个权威使这门学科达到了顶点。就以《楚辞》研究为例，两千多年来出现了那么多的有名望的学者，那么多的高质量的论著。就以当代《楚辞》学界而言，闻一多同志也好，郭沫若同志也好，游国恩同志也好，姜亮夫同志也好，成就都是相当大的。但是，是不是说《楚辞》研究就已经到顶了呢？闻一多同志等就已经完满地解决了《楚辞》各个方面的问题了呢？显然不是。你如果勇于探索，勇于创新，你也一定会取得成就，一定会超过他们，这是肯定的。因为学术总是向前发展的，关键在于勤奋钻研，勇于探索。1980年5月，胡乔木同志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次党代会上指出：“我们永远不能满足于重复过去的答案。随着历史的前进和人类知识的前进，每个时代都要寻求和过去时代不完全相同的答案。”^①胡乔木同志的这段话讲得很精彩，希望同学们好好领会。

作为一个学术研究者，在自己研究的领域应该有自己的结论，有新的见解。美国学术界对一个学者的评价，就看他有没有自己的见解和自己的科学体系，这是唯一的标准。最近中国有不少学者到外国去参加学术会议。据他们回来介绍，会议在接受论文时，对那些只是归纳总结过去的结论，洋洋洒洒数万、数十万言的论文，一本也不要；但是如果你有创见、有突破，几百字的文章也被视为宝贝（重质量而轻数量）。拿我自己来说，我也想在《楚辞》研究中有有所突破，但我感到，我的研究方法是落后的，下的是笨工夫，因此我也创不出大的奇迹。我在不少问题上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但是在研究方法上没有再大的突破。我往往是看到了一些新的资料，触发了思维；或者是对旧资料提出一些新的解释。但我还没有真正

^① 波按：胡氏的讲话全称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根本任务——1980年5月28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次党代会上的报告》，后收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胡乔木文集》第3卷中。

做到勇于探索，胆子还不大。尽管如此，我在研究工作中对自己的要求始终是：决不简单地重复别人的结论，一定要有自己的见解。努力探索，争取为学术事业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以上我所谈的，是端正学风的问题。现在我谈第二个问题，即学习与思考的问题。

关于学习与思考，我国古代早有人提出了。孔子就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就是说，光学习而不进行思考，就惘惘然而无所得；光苦思冥想而不学习，就颇有些危险。看来孔子的这两句话很有点儿辩证法。孔子还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在孔子看来，学与思的关系不是平列的，而是有轻有重的，孔子是把学习摆在第一位的。我觉得，学与思的关系是这样的，即要在勤奋学习的基础上发挥巨大的思考力，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我最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新发表的清末著名学者王国维的书信，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对我很有启发。王国维先生在信中写道：名家读书的时候，眼光力透纸背。这句话就是说，凡是在学术上有所建树的人，读书时决不是浮光掠影，走马观花，而是独具只眼，能思考问题、发现问题。我们常说读书时要在字里行间发现问题；而名家却可以力透纸背，更深入一层。我们如果把王国维先生的话再引申一下，似乎可以说：如果我们读竹册木简，则应该“入木三分”。总之，一句话，要刻苦读书，更要善于读书，在读书学习的过程中积极思考，发挥巨大的思考力。王国维先生正是这样读书的，所以当他看到一个资料，就可以得出出乎我们意料的崭新的结论。^①

关于学与思的关系，我强调要善于学习，善于思考，在学习的基础上更善于思考。学习一般人理解为是被动的，而思考则主动一

① 波按：景麟公对“屈赋中许多千秋难解之谜”的成功破解，当也是得益于此。

些。善于思考才有收获、有创见。我们应该养成善于思考的好习惯。^①

清代著名学者戴震，是朴学大师。他十岁时才能说话。这说明他小的时候并不是“神童”。但他发奋读书，又善于思考，学问长进得很快，终于成为清代很有名的学者。他读私塾时，私塾先生讲《大学》，讲到朱熹调整了《大学》原书的许多章节，又加了许多注解、说明，使之成为一个体系。例如《大学》“大学之道”至“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一段，朱熹注曰：“右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朱熹这样讲，没有任何根据。而私塾先生当然是依照朱熹的说法去教戴震。戴震问他的老师：孔子、曾子是什么时代的人？老师回答说：是春秋时代的人。戴震又问：朱熹又是什么时代的人？老师回答说：是南宋时的人。戴震说：孔子、曾子与朱熹相隔将近两千年，朱熹凭什么说曾子述孔子之言，门人又记曾子之意？他的根据是什么？戴震的提问，他的老师回答不出，就是朱熹本人还在，他也回答不出。因为朱熹是无根据地推测、想像。虽然当时朱熹的说法是“钦定”的，但戴震却敢于提出疑问，敢于反对朱熹的意见。他从小就有思考问题的习惯，这很了不起。他后来能成为一代朴学大师，与他从小善于学习、更善于思考是分不开的。他对于学问，不仅仅是知其然，更重要的是知其所以然。如果不善于思考，则把朱熹的话背下来就行了。但戴震不是这样。这个故事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在清代学术派别中，戴震是“皖派”，注重考实、创见，这跟苏州惠栋“吴派”不同。^②

我常常给同学们讲，读书学习的时候，脑子里要多有些“句号”“逗号”和“问号”，尤其是“问号”。读书学习是打基础，要一丝不

① 波按：但数年后，屈学界颇有放松扎实读书、学人或凭主观想像“定案”时，景麟公又提出“学思并重，以学为本”的观点。即倡导把脚踏实地的学习放在首位。由于时势不同而各有所重，其纠正学风之苦衷，又隐然可见。

② 波按：据我所知，先祖父景麟公一生最佩服的前辈学者，一是戴震氏，一是顾炎武氏。而对他治学影响最大的，当首推其师太炎先生。

苟。而我们谈到思考的话，则脑子里更应该多打几个“问号”。读书不能马马虎虎，要多问几个为什么。“问号”多了，将来可以成为你科研的题目。有些“问号”，你一边读书一边就可以解决；有些“问号”，多年都解决不了，比较难，但只要这些“问号”装在你脑子里，你书读多了，还是能解决一些的；当然有的“问号”，你这辈子可能都解决不了，学术界其他的人也解决不了，那就留给后人去解决嘛。这有点像“歌德巴赫猜想”，到现在虽然只证明到“ $1+2$ ”，但总是一步一步地接近解决。总之，我们读书学习时，脑子里总要打些“问号”。不善于打“问号”的人，不善于找课目的人，在学术研究中是不可能有多大成就的。^①

我孙儿小波，在读高中一年级的時候，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他写的题目是《我的爷爷》，文章里说：“爷爷是个活字典。”我看了以后叫他把这句话删掉了。我说：我不是活字典，我认不得的字、解不到的词还多得很，怎么是活字典呢？而且，我也决不愿意当活字典。我不愿意死记硬背多少字、多少词。死记硬背的“记问之学”是不足取的。因为我更看重的是思考。^②

下面谈第三个问题，即博览与专攻的问题。

所谓“博览”，是指读很多的书；所谓“专攻”，则是指在学术

① 波按：景麟公曾说，“干我们这一行的，我经常讲：在阅读作品时，脑海里要多有些句号、逗号，应当一字不苟；欣赏作品时，脑海里要多有些感叹号，在感情上要能产生共鸣；研究作品时，脑海里要多有些问号，那就是要从大量的文学现象中提出问题，遇到问题，就要追根到底，多问几个为什么，否则就会被动接受，不能主动思考。问题提的深度与高度如何，决定了你研究成果的大小。问题提得愈有高度、深度，那你的科研成果就愈大。不能提出问题，就谈不到科研工作”。景麟公曾在给我的信中说：“你来信说，平时看书，不善于提出问题。这确实是个重要问题。我认为能否提出问题，关键在于能否独立思考。如果一个人具有较强的独立思考能力，则在看书或看问题时，并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而是主动地分辨是非。如他人的论点‘是’，当然应该接受；如他人的论点‘非’，则你不仅不接受，而且能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这‘不能接受’，就是‘提出问题’；而又有自己独特见解，这就是‘解决问题’——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在这样不断地提出问题、不断地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的。”

② 波按：景麟公在给我开列的“楚辞学”与“传统文化”的必读书目时，要求我“在读的过程中，固然要记住；但更重要的是会思考”。